

刚留校时,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《诗经》

陈允吉

陈先生在探讨《离骚》等议题时,喜欢提出和郭沫若不同的意见。但他对郭沫若评价还是很高的,认为,“首先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三代之书,语言文字,历史文学,这是郭沫若最大的贡献”。我曾经注意到,陈先生研究《诗经》,论及《北门》《定之方中》《黍离》《兔爰》《楚茨》《生民》等篇,都对郭老有关的成果作了汲取。在坚持唯物史观这点上,陈先生和郭沫若是一致的。

在王运熙先生引领下初访师寓

我毕业以后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当老师,到教研室报到时,王运熙先生是教研室负责人,他对我比较了解,和我谈论我的进修问题。他认为我历史、哲学、思想史、学术史等方面的书读得太少,要补补课,多读经史。经主要是四部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,有条件就读读《尚书》;史主要是前四史。我遵嘱开始读,颇有收获。

1962年10月下旬,王运熙先生找我谈话,传达中文系开会讨论的决定,为落实周扬同志抢救遗产的指示,决定派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。陈先生当时年纪比较大了,他的学问要有传人。王先生自己毕业以后也主要是跟着陈子展先生的,当时陈先生是系主任,王先生帮他处理一些系务,所以他和陈先生比较熟悉。当时复旦条件比较好,青老挂钩,年轻教师都有老教师带领。

某日下午,王运熙先生带我去陈先生家,自复旦乘1路有轨电车到静安寺,转乘公共汽车到常熟路下车,转弯到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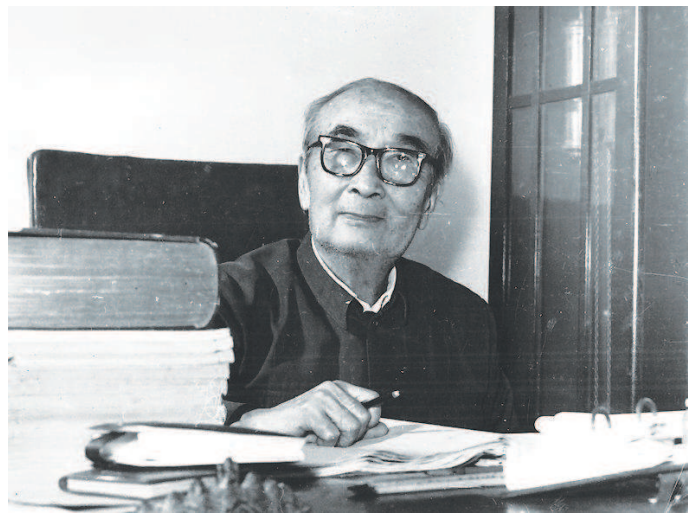
乐路,再步行到先生寓所。陈先生家在长乐路946弄2号,这里是个小弄堂,大门其实在942号,但一般是不开的。第一次与陈子展先生见面,我印象很深。陈先生当时大约六十三、四岁,个子不是太高,戴一顶法国帽,身体看起来还比较健康,思维、交谈亦很敏捷,只是抽烟挺厉害。唯一让我感到先生有点苍老的,是他的眼睑微微隆起,我想这是人生契阔与岁月沧桑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。

见了面,先由王运熙先生介绍我近期的读书计划,也就是多读经部和史部,他重点讲了八部书——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左传》《诗经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,围绕经史,再读一些经学方面的书以及学术史、文化史方面的著作,比如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、周予同的《群经概论》、梁启超的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》、顾颉刚的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等。陈先生认可了这一计划。王先生继续问,《史记》有三家注,有泲川资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,读哪种好呢?陈先生主张《史记》应读泲川资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,《汉书》应读王先谦的《汉书补注》。《史记》我早就读完了,读的是三家注点校本,《汉书》读了将近一半,读的是颜师古注,为此

不免心生顾虑。我和陈先生如实讲了这些情况。陈先生说这也可以,继续读下去吧。他对年轻人是很好说话的。不过,陈先生也说,以后碰到问题可以查考一下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和《汉书补注》。作为补偿,此后我读《后汉书》就用了王先谦的《后汉书集解》,《后汉书集解》的注释体例和《汉书补注》一样,在章怀太子注的基础上,增列了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。我读下来觉得很有好处。

另外,我和陈先生第一次交谈,相互语言不通,他说湖南长沙话,我说江苏无锡话,各自都听不大懂对方说话的意思,影响到了相互交流。但人对语言的适应能力其实很强,也很神奇,我和陈先生只是碰面了一两回,似乎方言的隔阂就不存在了,心里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。这样一来,和陈先生的交流基本也没有问题了,陈先生与我商定,以后每两周见面一次,时间定在星期四上午。开始一段时间一直如此,后来因为课程安排等原因,有所变动。

由于我平时不大上街,先生家又在上海市比较繁华的地带,所以从学校到先生家,仿佛穿越一条都市风景线,带给我长久难忘的感受。自复旦乘1路有轨电车到静安寺,刚好1小时,然后沿着宽阔的华山路步行,穿过延安路时可看到延安饭店,折入常熟路,虽街道不宽但景象繁华,随在所设的商铺亦益极精致,至常熟路长乐路口,能够见到斜对面安放着一面大圆镜,防止路过的车子相撞。那时常熟路以西、乌鲁木齐以东的长乐路尚未拓宽,路面狭窄犹如里弄,行人很少,也没有车辆来往,很幽静。陈先生自言“门无车马之声”。在常人看来,“身居里巷一隅,门无车马之声”,是寂寞了些,但对陈先生而言,却是做学问极好的环境。那时常来看望陈先生的,只有范祥雍和杜月村两位先生。在春夏间,有时942号大门开着,我就从大门进去,要经过一个院子,院子里种了几簇夹竹桃,开满红红白白的花,微风



1981年,陈子展工作留影

过,花瓣落地,悄然无声,看到陈先生在屋子里站着查考图书的身影,由此更能体会到他治学境界之高。陈先生书斋墙上挂着一张大胡子的相片,我跟随陈先生学习的时候,也没有太注意,这其实就是陈先生自己。后来杜月村先生告诉我,陈先生在摘掉了右派帽子以后,就把胡子刮掉了。

关于读书方法和研究途径

在谈到陈子展先生具体怎么教我读《诗经》之前,我想先强调一下他传授给我的做学问的通讯。

第一点,陈先生强调多读基本古籍。中国古典文献的要籍,是核心部分,要尽可能多读。在与我谈话中,陈先生多次援引《北史·崔儵传》的记载,谓崔儵“每以读书为务,负恃才地,大署其户曰:‘不读五千卷书者,无得入此室’”。其用意在于强调,阅读基本古籍要达到一定数量,俾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形成比较坚实的核心部分,亦是垫底的基础部分,便于融合其他知识,而不是具体需要研究什么问题时,才临时去读这些书。譬如经部和史部的书籍或重要的文集,就要提前打好基础。杜甫在诗中说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这些数量较多的基本古

籍,犹如压舱石,读过以后一生受用不尽。这其实也是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的基本功。

那时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培养青年教师,王运熙先生曾提出要做到“六书通”。不管搞哪一段文学史的,都要力求读通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文选》《文心雕龙》等六部书。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。要真正读通这六部书谈何容易,但认真阅读总比不读要好。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,脑海里也一直想着应多读要籍。“文革”刚开始时,大家都没法好好读书,后来有几年时间,也干不了其他事情,我便读了不少书,那时候主要是看古籍,每年大约看六百至七百卷。“文革”十年,我大概有五年时间是在点校二十四史,其他有三年时间,都在读书。能够坚持下来,和陈子展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,这也帮助我形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,特别是经部和史部,后来经部读得少了,二十四史是读了差不多大半的。

第二点,陈子展先生提倡的读书方法是“精读与翻阅相结合”。陈先生认为,古籍浩如烟海,读书不可能将所有的书都读得很细,也没有必要将每一部都读得很细。故除精读之外,还应该有翻阅,或者略读。他经常引用《魏略》记载诸葛亮读书“独观其大略”,陶渊明《五

(下转10版) ➡



陈子展
长乐路旧居
(从942号大门进入)外景一瞥